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参 考 资 料

(三)

中共梅县地委宣传部编印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伟大光荣的六十年

.....《半月谈》编辑部（1）

学习《决议》 资料

.....（38）

伟大光荣的六十年

《半月谈》编辑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周年。这六十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十二年的英勇奋斗，已经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为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相当可观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是伟大光荣的六十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上述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是很不容易的，它是经过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才取得的，是经过多次胜利、多次挫败，汲取了经验教训，使自己的认识和行动日益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以后

才取得的。

六十年来，我们党有过多次全局性的伟大胜利和严重挫败。这样的胜利和挫败，对我们党认识客观规律起过突出作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有两次，在社会主义阶段也有两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到遵义会议以后，主要是“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条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总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统一了全党和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和行动，亿万人民同心协力一齐干，才把那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推倒，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建国初期七年，我们取得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胜利；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我们遭到了“大跃进”的挫折；一九六一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取得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重大胜利；接着，我们又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败。也是“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再次比较”，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逐步确定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果说，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制定了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我们党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我们党确定的合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也必将指引十亿中国人民逐步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物质上现代化的、政治上高度民主的、精神上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十八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二十八年，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时期，中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到一九四九年才取得革命的胜利。

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和 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国出现了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三十万以上。这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巩固和发展了党的阶级基础，大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和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随后，我们党就依靠自己

的力量，推动和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建立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并通过国共合作的形式，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政治骨干的国民革命军，从而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胜利地举行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基本上推翻了当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先后叛变，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也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这一次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遭到惨痛的失败。大革命高潮中发展到近六万人的共产党，这时只剩下一万多人。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了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个反动政府仅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就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十三万七千多人。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杀绝、被吓倒。他们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战斗。这十年战斗，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主要形式，所以叫做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十年战斗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先在部分农村地区建立红色政权，等条件成熟时再占领城市、夺取全

国政权的独特道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反革命力量较小、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府，实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各种社会改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粉碎“围剿”的过程中，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三十多万人，共产党员也由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但是，正当革命胜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由于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白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色区域的革命力量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长江南北各地的主力红军，因“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没有能粉碎敌军的“围剿”，都不得不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实行长征。这次失败，使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党员也由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胜利和失败的尖锐对比，使党内大多数同志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于这个转折，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争取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为什么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先是胜利、后来又失败了呢？为什么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先胜利、后失败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集中力量从事理论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总结党成立以来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和文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的总结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下只列举其中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且多次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我们党处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总结。

一九二一年七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党就确定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这是我们党同国际上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相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党不同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打倒的是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面对这种实际情况怎么办？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指示和中国社会的特点，一九二二年七月我们党在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主张：第一步是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第二步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个分两步走的主张，也就是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反映了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认清了当前奋斗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不久，党提出的反帝反军阀的号召，就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大革命高潮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村大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坚决纠正在无产阶级领导问题和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以促进革命高潮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变成了所谓“二次革命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次革命，应当归资产阶级领导，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参加这次革命，只是争得一些民主、自由的权利。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以后，无产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多数，再利用已经取得的民主、自由权利，准备发动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按照这种“二次革命论”，陈独秀等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既然归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这一次革命中就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助手，不应当独立自主地领导农民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也不应当组织军队去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陈独秀等心甘情愿地充当蒋介石的“苦力”，帮蒋介石扩充势力。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反抗，这就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明确地指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个革命的任务不是反对受买办豪绅阶级打击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并实行土地革命。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开展起来，取得了很大胜利。

但是，在批判“二次革命论”的过程中，有一些“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他们总是急于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甚至把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有矛盾而积极要求抗日民主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这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的理论 and 实践，把本来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从我们党的周围赶跑了，使党和无产阶级陷于孤军奋斗的困境，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建党以来我们党在处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关系上的经验教训。他一方面反对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反对“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历史上欧美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当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同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无产阶级领导”问题，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

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因此,“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其中主要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众,特别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贫农、下中农。所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通过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把极其广大又极其散漫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结成工农两个阶级的巩固联盟,这就使革命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足以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第二,完整地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同时,毛泽东同志还要求我们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建党以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

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和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历史事实证明：正是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使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效地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从而推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第三，大大地发展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小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成广大的敌后解放区，大大地发展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建党以来武装斗争问题上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有了统一的认识，从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伟大成果。

在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经验，着重于领导群众运动，不懂得武装斗争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国条件下的极端重要性。当时我们党曾经有机会参加革命战争，但主要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帮助指挥官们做政治工作，是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国民革命军打仗。当时我们党并没有利用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利时机，以主

要力量去组织和发展自己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而是化了很大力气帮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去训练和扩充他的军队。“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在新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将工作重点从中心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变为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革命堡垒，用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地区的凶恶敌人，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积累、锻炼和发展革命的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在这种农村革命根据地上坚持的长期革命战争，不是通常的敌我力量相距不大的普通战争，而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大小强弱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特殊战争。从这种特殊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同志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方针和方法。也正是从上述特殊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同志成功地解决了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条件下，人民军队如何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自己的优点，如何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的问題。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军队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提出在作战中必须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把战略

上劣势变为战役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而且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等等。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这种军事思想的领导下，弱小的红军、游击队在强敌的不断“围剿”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地胜利发展。到一九三三年粉碎敌军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以后，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三十万人。共产党员的人数也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三十万人。

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中国的特点，照搬苏联的经验，坚持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他们先是呆在中心城市里，不断地组织城市的革命群众举行武装起义，不断地强令红军游击队进攻中心城市。实际上这就是把很小很小的城市革命组织和农村红军，公开地暴露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让敌人去消灭。结果，城市中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左”倾分子组成的党中央在中心城市里站不住脚了，于一九三三年被迫转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当敌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时，他们又照搬苏联红军作战的经验，不顾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强令红军和强大的敌军作阵地战，拚消耗。结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痛的失败，不得不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建党以来武装斗争问题上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科学著

作。这些科学著作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统一了全党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全党认识统一，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放弃了广大敌后地区，派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结果，在日军、伪军、国民党反动军的夹击之中，中国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却获得空前的大发展。人民军队的主力由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三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人口由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百几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小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变成了广大的敌后解放区。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大大大小小的城市，无不处于解放区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这就是说，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在祖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上铺展开来，成为伟大的现实。

第四，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还总结了一九二一年以来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中国条件下生活和战斗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联系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总结了一九二一年以来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成功地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理论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成功地解决了领导中国革命所

必须解决的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三个基本问题，即“三大法宝”问题。这些理论、政策和“三大法宝”，都不是任何人臆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从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包括上述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合乎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广大的党员、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从而也认识到反映这种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一九四五年举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党正式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正是由于全党的认识逐步统一，统一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战争，才能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充实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三大法宝”的内容。当蒋介石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我党就